

## 從 Charles Taylor 離根理性觀照當代心理學發展之挑戰與解方

張家群\*

### 摘要

Charles Taylor 提出「離根理性」是當代西方文化系統在理性主義興起之後的「硬核」。西方文化系統在理性主義後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均來自於此一核心概念的延伸與發展。與此相對，當代西方文化系統的挑戰，亦來自於此一核心的過度延伸。本文以 Taylor 的理論「離根理性」為主軸，以文化系統發展的觀點，來審視西方文化系統中，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興起與挑戰。藉由討論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離根理性；以及隨著此核心特性的過度延伸，「離根理性」變相地轉化，形成其中一種極端的演變結果，即為「實證主義」。此種趨勢逐漸型塑出當代科學的片面性，強調以「程序正義」取代「本體內涵」，形成「本體論的錯位」現象。最終，「本體論的錯位」導致在道德哲學中的虛無主義以及在道德心理學上，跨文化的不適切性。當代心理學，亦處於上述理性主義思潮的背景視域下，因此「離根理性」亦反映在當代心理學的發展軌跡中，產生了「心理學碎片化」、「去個人化／極端個人化雙極對立」、「去意向化」的三大特點。本文以筆者多年在實務工作中從事心理治療的經驗，討論以上三點對於心理治療的影響。本文認為，當代心理學必須正視來自西方文化系統影響下的挑戰與限制，並融入中華文化系統中，更為先進的系統觀，重新整合成為「整體的」、「動態的」與「完形的」「人觀」與「治療觀」。藉此取代將人分離成為各個學科主題的當代心理學所預設的「人觀」與「治療觀」。本文並且藉一個小規模先驅性實驗研究，說明如何以系統性的「人觀」與「治療觀」創造不同的心理治療之可能，並實徵驗證此一新形態心理治療的治療效益。本研究結果發現，新型態的心理治療可以不同的路徑協助案主面對獨特的挑戰。最終，本文討論不同文化系統間如何看待彼此的建議，並且建議應重視心理學文化根本，以及由此文化根本所延伸的獨特現象。

**關鍵詞：** Charles Taylor、心理學的挑戰、理性主義、離根理性、實證主義、實徵研究

張家群\*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Changchiachun001@gmail.com)

## 壹、從離根理性看西方文化系統中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興起與挑戰

Charles Taylor（以下簡稱 Taylor）針對現代西方理性主義展開省思，提出「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ing）是型塑現代西方社會與科學的重要核心特質，同時「離根理性」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系統認識自己與世界的特殊限制（Taylor, 1989）。

自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以下簡稱 Descartes）以「我思故我在」為核心開啟西方理性主義思潮以來，西方文化系統形成強調「理性」之主體性與優位性的傳統，「我思」（理性）被視為「我在」的必要條件。由此，理性遂與生成「自身的根源」及「據以活動的環境脈絡」彼此分離。由於「自身」是理性主體的「本源」，而「據以活動的環境脈絡」是理性主體據以形構現世活動的「現象之根」，西方理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將理性主體從自身的兩種根源剝離，此一特殊的文化系統發展現象即謂之「離根理性」。

Taylor 無疑地是反對此種離根理性的。對 Taylor 而言，主體的真實樣貌並非離根的：「作為一個著根（engaged）的主體，我們必然是在世界之中根據脈絡進行調適（coping with）的，（我們）無法離開這個世界……主體的經驗只能在世界與脈絡之中才能被理解，主體在世界（與脈絡）之中方知何去何從（Taylor, 1995）。」

此種去脈絡化的理性，原本僅是認識世界的諸種可能途徑之一，但是，後續西方文化系統在脫離宗教桎梏的發展過程中，為了擺脫世俗化與威權化的宗教形上學，遂結合理性的優位性而發展出以「認識論」取代「本體論」的傾向，使得這種認識世界的態度或方式逐漸轉型成為一種具有去根源化、去脈絡化的理性主體「離根理性」。此一假設性的理性主體形成了西方文化系統的基礎，一方面滿足了彼時西方社會急於擺脫宗教桎梏的需求，並推進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然而另一方面，「離根理性」同時卻也將原本「身體—心理—靈性—環境」的整體系統，錯置為以理性代表心理與靈性，並且獨立於所處的整體系統脈絡之外，使之凌駕於其他非理性主體之上，而形成了獨特文化價值（Schluchter, 2014），並以此種離根理性，共同形成了現代社會面對環境與他者時，對立與宰制的底層結構，從而形塑了現代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共產社會中二元對立的基調。

本章首先介紹貫穿 Charles Taylor 理論體系的重要概念「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ing），闡明離根理性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發展路徑與趨勢，並且提出此一發展趨勢所帶來的獨特挑戰「本體論的錯位」，及在此發展趨勢下，對指導人的幸福生活的道德哲學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其後帶給科學哲學的極端影響：實證主義。本章最終批判西方近代發展的主軸有其時代脈絡的特異性，並且此一特異性在心理學研究中（實際上是所有與人有關的研究中）帶來了特殊的挑戰。

### 一、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離根理性

Charles Taylor (1989) 提出「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ing) 作為對於現代西方文化系統發展的根源性批判主軸。在 Taylor 理論體系中，「離根理性」用來指涉西方文化系統近代發展裡，認識論主體的現代化轉換及其特性 (Taylor, 2001)。人的認知活動「理性」原本不應與其所產生的來源 (即人本身及其對應的環境) 分開討論，但理性主義逐步將理性過度高舉，從而替代了古典哲學上本體論及形上學的位置，使得「理性」與產生它的兩個本源：「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因此 Taylor 特意將此一特殊的文化發展現象命名為「離根理性」。實際上，若我們脫離西方文化系統發展的觀點，用其他世界的文化系統對西方的理性加以詮釋與理解，還會發現「離根理性」不但把理性從「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更是把「人」與「一個假設的人的創造者」(本文在此所謂的創造者，是一個含混且並未指涉是否具有人格與神性的創造主體) 彼此分離。

由於離根理性的影響，使得近代人文學科研究之興趣，逐漸從形上對象的本體論，轉換到認識論與方法論。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科學興趣與討論內涵發生了轉變，更重要的是，在此一轉換的過程中隱含了西方文化系統的主體轉換。劉志洋 (2007) 為 Taylor 在對西方文化系統的批判觀點，下了很好的註解：「……Taylor 批評當代的自然主義趨勢使其知識論遮蔽、誤解了人的本體論面貌，在哲學的論辯中給予認識論優先的地位。」此種轉換的結果是弊大於利的 (Taylor, 2000)。弊端是：由於認識的對象，從本體轉移到「認識」自身，於是科學活動的重心遂以「建構認識程序的標準化格式」取代了本來對「實質本體內涵與意義之理解」的傾向。

雖然如此，但以回顧歷史軌跡的角度來看，現在看起來的弊端，在西方文化系統肇始理性主義革命時，卻是有其正面時代意義的。世界文化的發展歷史中，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系統自 Descartes 以「我思故我在」為核心，開啟了西方理性主義思潮。此觀點深刻地影響主流西方文化系統。發展至今，將理性主義稱為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Hardcore) 亦不為過。所謂的「硬核」是由 Lakatos 所提出來的，用來表徵一個理論體系作為體系核心的概念，這一組概念有著不易改變，自成體系的特性。

Descartes 建構理論體系的時代背景，正處於天主教世俗權威仍然堅不可摧的時代。因此，雖然日後 Descartes 所開啟的思潮對天主教的世俗權威產生了關鍵挑戰，並且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但是，Descartes 起初思索問題的基礎，卻是與尋找終極的哲學基礎息息相關的。Descartes 認為，人與世界的關係，必須有個善良超越的存在，才能保證人與世界的關係是真實的。從而肯認了上帝的終極存在地位 (傅佩榮, 2020)。在此背景之下，Descartes 追索：「我們認識世界時，有甚麼可靠的基礎？」Descartes 在思索此一問題的過程中，提出對於亞里斯多德 (Aristotélēs) 經驗主義觀點的質疑，認為人的感官經驗並不可靠，易被外界刺激影響，感官經驗總是隨著外在刺激的

變化而改變，使得感官經驗缺乏穩定性，因此是不可靠也易受蒙蔽的，故不足以作為認識世界的穩定基礎。但是，人畢竟只能透過感官經驗獲取外在世界的資訊，因此 Descartes 進行了一次層次性的跳躍。他認為，無論我的感官經驗是正確的或者是被蒙蔽、被扭曲的（我思），但畢竟得有一個承受經驗的主體是必須存在的（我在），因此得出了著名的重要命題：「我思，故我在」。從此，「我在」成為 Descartes 哲學體系中穩定的起點與基石（Barzun, 2001）。

劉志洋（2007，43 頁）在論述由 Descartes 哲學體系如何發展成為離根理性時也討論了促成發展背後的天主教歷史脈絡：

值得關注的是這個道德精神最大支持的根源，對笛卡兒來說回到內在的理性最後還是證成了神的存在，有神論依舊供給笛卡兒的道德體系所需資源……笛卡兒始終擁有一個神意的秩序概念，神從未在他的視野中消失，理性和上帝的秩序是一致的，只要運用理性的程序建構，我們就能夠連繫真理。

「理性現在是主體思考的內在特質，而不是實在觀點之構成……上帝的存在成為是我經過清晰見解的方法程序朝向科學進步的階段……」。

我們從事後觀察的角度來看，在 Descartes 的理論體系中，上帝仍然提供理性一個終極與形上學的支持，也就是說上帝從未自 Descartes 的體系中退去，但是後續理性主義的發展，在當時歐洲民族國家崛起、極欲擺脫天主教會權威的背景脈絡下，很快就像脫韁野馬一樣，站在宗教的對面，被各個政治實體援引成為對抗天主教世俗權威的思想基礎。而且更進一步地，上述「上帝的存在成為是我經過清晰見解的方法程序朝向科學進步的階段」則證成了「清晰見解的方法程序」的關鍵性，因此，討論人們如何可能認識的認識論以及如何使認識論成為具體實踐可能的方法論的重要性，取代了形上學的本體位置：理性主義者將「我思」當成「我在」的必要條件，並將「我思」當成探索的重點，而將人的理性高舉於人的存在之前。雖然 Taylor（1995）指出「後來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以時代錯置的方式誤用 Descartes 理性的概念。」但時代的發展仍然使得「我思」逐漸脫離其賴以存在的主體「我在」，從此「我思」（理性）成為了西方文化系統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此一核心形成強調「理性」的文化傳統。雖然這個哲學傳統在休謨（David Hume）的極端經驗主義與懷疑論之下，一度遭受強烈的挑戰，但康德（Immanuel Kant）重新提出有限理性論，為理性在其整個哲學體系中找到新的定位之後，強調「理性」之主體性與獨立性的傳統，遂成為西方文化系統的特色與基石（De Pierris & Friedman, 2018）。例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評論 Descartes 時，即認為其「……是現代哲學的倡導者，為現代哲學奠定了穩固基礎」（引自傅佩榮，2020）。

至此，整個西方文化系統可說承襲了理性主義的大潮流，將理性視為人的特色以及認識世界的關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文藝復興開始，其後的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興起、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競爭，乃至於兩次大戰之後共產與民主的陣營對立，冷戰後各國對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進行修正，乃至商品社會與世俗社會的形成都離不開理性主義的影響（Barzun, 2001; Taylor, 2000）。

在此潮流下，哲學中認識論的地位一舉提升，取代了此前經院哲學中本體論與形上學的主體位置。從此，人如何更理性地認知世界，變成比在現象世界背後探究本質是何面貌更加重要的議題。可以說，西方文化系統在 Descartes 之後經歷了一場探索目標的典範轉移式的巨大轉變。人們的探索興趣，從經院哲學中對神的本質探索以及用以表徵世界本質的人—神關係之探索，轉變為「如何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認識世界」。

本體論與認識論的關係，在此脈絡下，也從原本的「由本體推論方法」，轉為「以方法上的程序正義取代對本體的推論」。然而，這種貶低形上學與本體論的歷史發展，卻從根本上導致了西方文化系統走向虛無主義的傾向。畢竟，此種貶抑形上學與本體論的作法就好像「將洗澡水與嬰兒一同倒掉」（黃光國，2018）一樣，將對本體論的後續探究與發展扼殺在襁褓之中。亦即在此傳統下，西方文化系統實質上面臨了將其傳統哲學中關心的「本體」虛無化，去功能化與重要化，從而導致整個系統產生空缺與失衡的問題。

自此，希臘哲學傳統中從柏拉圖（Plato）開始提出著名的「洞穴意象」，起始，開始著重由洞壁上火光所映照出來的影子，推論影子真實的本體就在哲學家身後，延伸出來由現象推論形上本體的傳統以及現象—本體的整體論傳統亦均遭到抑制。

## 二、離根理性極端轉化：從「本體論錯位」到強調表面性、片面性、程序正義

離根式的理性主義興起的後續發展是如此地出乎 Descartes 意料之外——由於理性主義強調理性對於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使得「神」在道德領域中終極裁判者的地位，被方法上的程序正義所取代。以此作為濫觴，上承 Democritus 原子論，下輔以 Newton 機械論宇宙觀在對自然世界解釋與利用上的成功，使得拆解整體系統，針對組成系統元素之間的關係進行機械論／原子論式的分析方法，一躍成為西方認識世界的主流科學觀點。此一發展亦有歷史的外部因素，由於上述「神」在道德領域中終極裁判者的地位，被方法上的程序正義所取代，因此使得此種以程序理性取代終極超越的裁判者這個存在本體的思維模式，正是離根理性所派生的產物。因此便為當時的西方社會正在興起的科學革命找到了對抗宗教權威的基礎（Schluchter, 2014）。

從此，文藝復興以後的科學家樂觀地認為，世間萬物都能以機械論／原子論的方式進行分析，並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最佳的、對萬事萬物的理解／控制／應用。更進一步地，由於此種分析的尺度與結果均能夠被人的感官經驗所掌握，故產生了此種方式是最符合

理性的「幻想」。由於此前理性主義的發展，將理性（我思）定調為「我在」的必要條件，更使此種預想推動「理性」與「我的存在」強烈彼此證成。使科學逐漸取代神學的地位，給予人類存在位置與意義的替代解釋。

其中，將此潮流推演得最為極端的即是所謂的實證主義科學。實證主義者 Schlick (1936) 甚至認為一個命題的意義，即是實證它的方法（引自黃光國，2013）。一旦一個命題的意義轉變成了實證它的方法，那麼命題本身的內涵以及在特定環境下的作用，都變成了可以忽略的東西，科學的意義完全變成了一種科學家腦中的猜想是否與實驗室中所得數據對應一致的遊戲而已。此種以方法的正確性取代對本體的探討的謬誤，具有西方文化系統發展的特定背景。但邏輯實證論者卻將其作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方式，即屬對科學與認識論的誤解了。畢竟「理性活動」本身，實屬存在者整體心智活動的結果，因此無法脫離進行認識活動的本體而獨立存在。僅僅探討理性主體活動所產生的結果（理性），而忽略理性主體本身的樣態，則會忽略了來自理性主體本身的特性以及理性主體與環境動態互動發展的特性，終而失之偏頗。

更有甚者，科學活動遂轉變成為是否符合某種編輯標準／遊戲規則的人造語言遊戲。在這其中，對於問題及其解答之追尋，逐漸成為僅僅重視追索的過程是否合理，及其結果的呈現形式是否符合一個科學社群公認的既定規範的「填空遊戲」，而不再真正重視問題與解答內涵的實質意義與實質衝擊。如此的流變造成人類與其所欲認識的世界之間彼此疏離（曾國祥，2004）。結果學術機構愈是強調制度化與結構化，愈有行政上的規制性與正當性，則愈形構新形態的、人認識世界的障礙。同時，此種制度性的障礙更讓科學的外部史影響科學發展的能力極大地超越了科學內部史的地位：既然重視追索的過程與形式規則之「正義」，那麼掌握規則制定的權力，就變得比真實擴展對於世界的認識更加重要的事情。如此使得科學發展的外部史得以凌駕科學發展的內部史，為學術派系及政治權力提供了侵蝕學術創意與文化發展的可能缺口。

葉啟政(2019, 64 頁)如此評價西方文化系統啟蒙運動後理性主義思潮的負面影響：

……笛卡兒有意透過主客二元的說法，來彰顯人作為認知主體的能動性。但是一旦人們開始建置定型化的科學方法和邏輯思辨（例如實證主義的信條）。來界定科學理性的內涵之後，定型的科學理性形式並不足以立即可以用來證成人的主體性。或許情形正是相反的。事實上，逐漸地侵蝕著人的主體性，而終把它架空、或甚至逼它讓出位來。總之，正是因為人們持有著如此一般的主客二元分立對彰的認知立場，才讓（科學）理性脫離人本身，成為一股龐大而自主的建制性的怪力。

葉啟政的批判，正好呼應 Taylor 所提出的離根理性概念，而且更進一步地點出，主

客二元分立對彰的認知立場是造成此一影響的重要原因。此外，其所謂的怪力，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加以詮釋與分析。一方面，是認識論的問題。此種從理性主義脫胎而來的離根理性，與西方科學的片面性傳統（one-sidedness）彼此交互影響，從而使得人類對於自身的存在與所處脈絡的探求，逐步降解成為一種片面性簡化的實證資料與假設之間的線性關係。

另一方面，葉啟政（2019，64 頁）特別提到「定型的科學『理性』建制形式」對於科學探究的負面影響。這是因為當科學家主動自發，且在形式上自由無拘的探索，逐漸被體制行政化、規制化、格式化後，對於外界的探索遂有了既定的計分標準，有了既定的計分標準，科學活動遂降解成為學術對於現實功利的「競爭力」、變成僵化的教條與學術格式；對於問題與真理的探究亦降解裂變為追求格式與形式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尤其，此種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與對本體的理解本身具有差距，雖然可能彼此有關聯，但並不能真的保證程序與格式正義就對本體的理解產生更多的認識。因此最終，反而侵蝕研究者的探索自由與不受限於當代體制的創意及多元可能。失去了此種自由的研究者，終將退化成為僵固體制中著重格式的文書編輯人員、著重分類的圖書管理員或著重行政形式的高級行政人員而已。而上述三者，雖然都可能是某些機構中的執行者必須具備的良好品質，但無疑地都並非一個探究人類知識邊界的探索者充分與必要的特質。

綜合上述，可以將西方文化體系的發展主軸描述為：現代西方文化系統，肇始於理性主義，在擺脫天主教世俗權威的時代脈絡下，產生了以離根理性（人類認識世界能力的一部分）替代上帝，形成了「以認識論替代本體論」的「本體論的錯位」現象（張家群等，2016；Chang & Shiah, 2018）。「本體論的錯位」現象意指：原本給予本體依歸與道德指向的「本體論形上學」的位置，讓位給「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與人本的「自由原則」，這造成了道德哲學與道德心理學的本體虛無化與文化限制，使得「道德」這一人類的整體活動被碎片化地區分為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所討論的、道德發展的標準被簡化為與「習俗」（convention）的關係。「離根理性」與「本體論的錯位」亦表現在後續的科學發展上，這兩者的極端結合，催生了「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脫離西方文化的根源，不再探討現象背後的本體，轉而僅注意能被測量的表面現象；不再給予探索現象背後機制的探索者科學的桂冠，反而注重「外部史」表面的形式與規制；刻意忽略了由深層結構與機制整合的系統整體面貌，反而以離根理性支持原子論的簡單化約，將許多系統的整體現象，不當地化約成為碎片式的細節。

於此必須特地說明，此種規制化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並非一無是處。規制化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能夠提供學術社群的參與者與其他團體之間區別的身份認同（identity），因此有助於學術社群的認同與形成，如此，在科學的「外部史」結構上，規制化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可能成為推動學科與學術社群發展的重要動力。此種力量在當時科學社群推翻天主教世俗權威的背景脈絡下，無疑是重要的。然而，若是把此種

對於科學發展外部史的動力，錯置為評斷科學成就內涵的、跨越時代脈絡的唯一標準，則本文認為是一種嚴重的倒置，同時也會阻礙科學的多元開展。

倘若我們對此一文化現象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甚至變本加厲地「自我殖民」(黃光國，2015)式地複製西方的方法學，則所謂的科學活動就變成僅僅是在規範內複製與生產大量符合標準化格式規範的、產出過程一致的學術工廠產品，甚至將學術論文是否符合某種格式規範，視為作者是否承載學術資格的必要且充分條件。至於作者是否具備符合其學位的問題找尋與問題解決能力、論文的內涵是否真實地能對人們解決問題或對世界產生衝擊，都僅在於其次了。而學術體系也就淪為單純的集點活動而已了。如此，便產生了黃光國(2021)所謂的(心理學)自我殖民式的困境。

### 三、離根理性對道德哲學的衝擊

在此，本文刻意使用「正義」一詞是帶有深刻貶意的，因為此處所謂的正義內涵為何？究竟由誰制定？被如何用來進行政治層面的運作？乃至於運用「正義」的結果對誰有利？都極有可能生成壓迫與剝削體制，而進一步限制了對世界探索的自由。或者，最低限度而言，體制也會對社會該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產生影響，繼而間接地限制了個人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上述對於「正義」的批判，引領本文思考此種以認識論代替本體論所造成的「本體論的錯位」(張家群等，2016；Chang & Shiah, 2018)如何影響道德規範及現代社會對於道德的定義與想像。而這正是 Taylor 離根理性概念對近代西方文化系統發展在道德層面上的批判。

Taylor 認為「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客體化概念(即離根理性)將人抽離出生活的意義。一方面以知識論的確立來排除本體論的探問，另一方面人無法再確認任何單一的良善生活標準，人們改以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序來解決對於認識良善生活的力有未逮之處」(引自劉志洋，2007，2頁)。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序」實際上並不能夠保證最後的結果就是良善的，「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序」僅能保證過程的中立與合理性，但卻無法回答特殊脈絡底下的適切性與實用性，從而也無法回答良善的內涵究竟為何。

由此，不但本體論被離根理性認識論所取代，道德哲學也被離根理性式的認識論所支配。於是道德哲學不再提供人們追尋人生價值的意義內涵，反之，僅僅是討論如何形成道德標準的程序。理想上，這麼做的好處便是提供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重要核心基



礎——從羅馬教廷手中將個人與上帝溝通的權力奪回。如此，便使得道德的標準從此，由定於一尊的天主教權威手中，下放到每個人自行與上帝溝通探索。從而使得整個歐洲的政治與社會從天主教世俗權威體系中獲得了解放，其後遂逐漸形成了民族國家與一統的天主教教宗體系彼此競爭在政治與社會上的話語權。

此種道德哲學顯然對西方文化系統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且純以結果而言，重新賦予西方文化系統新的活力。可以說是好處大於壞處的。然而，我們在探討此一文化發展時，往往忽略了發展趨勢對整體文化系統的發展而言是好是壞，是不能脫離系統本身的發展脈絡加以討論的。亦即，離根理性對西方文化系統的好處，其實是有著西方文化系統黑暗世紀中將天主教體系定於一尊這個特定歷史脈絡的，脫離了這個歷史脈絡，離根理性其實也可能對整體文化系統的發展產生阻礙。

黃光國（2021）以「科學主義的魔咒」來命名此種來源於西方離根主義認識論所造成的、本體論上的虛無主義以及道德心理學研究中的跨文化不適切性。Hwang（2020）批判以康德倫理體系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系統過於歐洲中心主義，且據以形成理論的基礎樣本多是來自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政體（Democratic）這樣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Henrich et al., 2010）。而此種據以建構理論樣本來源的偏差，事實上只是西方文化系統的表面而已，它的底層文化發展脈絡，仍舊是離根理性的流變。

離根理性另一個重大的問題是：將人從其所生成的環境中抽離，而使人將環境工具化，環境不再是生養人的「天地父母」，而一夕之間轉變為從屬於理性、能被恣意利用的「工具」。如此一來使得環境的不合理利用正當化；將人與他者的關係碎片化、工具化、功利化、去關係化，讓人與他者產生異化與疏離；由於賦予理性獨特的地位將理性高舉，使得那些高舉理性發展的社會，面對其他不以理性為發展主體的文化與社會，產生了殖民者式的優越感，造成文化衝突甚至文化戰爭。最終形成近代史上階級、宗教、種族等等的異化（De Wit, 2018）。

總和而言，本文對理性主義所持有的根本立場是：理性主義跟所有其他認識世界的方式一樣，都具有優劣之處，只是當代社會忽略了西方文化系統中產生離根理性的特定脈絡，而過度提倡理性主義的普世性及優點，反而忽視了西方文化中理性與存在者本身的分離，導致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缺憾。過度高舉此種離根理性式的認識論的結果，使得本體論與道德哲學由於失去了形上本體的超越位置，並在以認識論及方法論的程序正義填補失去位置的本體論時，造成了本體論的錯位。最終使得整個體系受到虛無主義的威脅。繼而，為了解決此種威脅，道德哲學遂不得不讓位給程序上的正義，使得道德的判斷不再依據對「良善」內容的具體認識，而僅僅能依附於產生道德判斷時的程序上是否正義。此種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不可不加批判的直接接收，必須如 Hwang（2019）所強調的，經由研究者具有文化系統發展意識的分析，方能作為借鑒，解析吾

人當代所處情境之優勢與劣勢，並進一步尋得正確的科學探索之路。

離根理性對道德哲學所產生的影響，使得西方社會在進行道德判斷時，獨重程序正義，亦影響當代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發展方向。首先在心理學中，從 Kohlberg 開始，將道德發展引入心理學的關注範疇作為濫觴，道德與利他成為心理學的重要議題。然而，黃光國（2021）即提及，世界各個文化體系在檢驗 Kohlberg 道德理論時，很快地遇到了難以解釋的爭議資料。在與西方文化系統社會相異的地區中，按照 Kohlberg 的典範進行研究時，諸多學者均發現無法使用 Kohlberg 的理論框架來為異文化的道德觀點進行有效分類，或者無法使用 Kohlberg 的三期六段原則來妥善地區分不同文化中受測者的道德發展階段，「對 Kohlberg 理論構成最大的挑戰」（黃光國，2021）。於此同時，西方心理學者也對此有所警惕，開始反思理論在適用於異文化中不一致性的來源。Shweder（1982）即認為這是由於 Kohlberg 理論體系背後其實預設了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之故。但是預設了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究竟會對道德心理學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後續許多學者開始以不同的角度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例如：Gilligan（1982）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思考，創立了以關懷原則為核心的關懷倫理學，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正義核心原則；Graham 等（2013）、強調道德直覺與情緒面向，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認知主軸；Haidt（2007）試圖將道德分析成為數個共通面向，認為是這些面向共同構成了道德的「道德基礎論」，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單一認知面向。然而，這些對於作為起始的 Kohlberg 理論體系的批判，以本文的脈絡來看，實際上都仍然處在同一個文化脈絡之中，因此無法看到自己的共同問題。

所有上述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心理學家，均忽略了離根理性早在當代西方心理學成為獨立學科之前，即已深深地影響該文化體系底下的所有人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離根理性早在心理學成形前，即已將程序正義優於對本體本質的探尋深深植入所有人的思想底層之中，使得所有的西方道德心理學者，均只是在換著不同的標準，嘗試對「道德的結果與現象」進行不同方式的「分類」，並且爭執著誰的分類方式更具程序正義性而已。即便諸學者均強調自己從不同文化的角度來進行道德心理學研究，終究也不過就是將「杜威十進位分類法」，轉換成「中國圖書分類法」而已，骨子裡仍然只是對諸種道德現象與結果，採用不同的面向進行分類而已。然而，僅僅只是知道一本書放在書架上的哪個位置，是無法告訴讀者書中內容的。而且，由於不同理論之間僅僅是分類角度的不同，因此理論之間幾乎無法對話，不同的分類標準，自身即具有足夠的程序正義性與完備性，因此很難說 Gilligan 的關懷心理學優於或劣於 Kohlberg 基於正義的理論框架，反之亦然。更不用說不同的分類標準常常僅適用在不同的脈絡與角度之下，因此當探討的脈絡改變，分類標準的適應性也得隨之改變了。

此外，由於離根理性傳統，在經由上述「本體論的錯位」之後，學者的視野與興趣，

本質上即產生了摒棄形上學甚至哲學的傾向，因此這些學者普遍忽略了「能產生發展的，永遠都是人，而且僅僅只有人，道德本身不會發展」此一事實。所以，所謂的道德發展實際上真正在問的是「人如何隨著自己的發展，來面對道德挑戰」？而這之中的「發展機制」為何？因此「道德」的真正本體問題一直都是人如何面對他的環境，從而使他自己以及有所牽連的他人能更進一步地發展。但是，隨著離根理性的影響，這些重要的道德問題，根本不可能進入當代心理學的討論之中。這也正反映了離根理性以「我思」（道德現象）取代「我在」（思考道德的人自身）的特色。

簡而言之，本文認為西方道德心理學的真正問題，從來都不是不同的文化如何看待道德的問題，而是西方科學的整體發展，使得當代心理學誤讀了「道德」真正重要的本質。當應該去追問人如何隨著他的修養發展，更適切地處理道德挑戰時，我們卻在追問不同的文化是否會形成不同的分類標準；而當應該詢問怎樣的「機制」能夠更好地協助個人，適切地面對道德挑戰時，我們卻被誤導去比較不同的分類標準何者更具優越性與普遍性。

由於西方道德哲學延留至道德心理學之問題的本質，一樣是來自於離根理性後續的本體論的錯置，使得本體論遭遇虛無化的脈絡。而除了道德心理學遭遇此種困境外，心理治療，甚至整個西方心理學亦面臨了相同的考驗。故本節花費眾多篇幅分析道德心理學所面臨的挑戰，即是希望兩者併陳給讀者，使讀者在比對兩者的發展時，能感受到底層文化系統發展的重大影響。

此種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在面對以人類及人類活動為主體的心理學上，離根理性的缺憾，比之其他領域更為關鍵。此種離根理性，使得當代心理學落入碎片化、去差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主體、去意向化三個面向的困境。

## **貳、離根理性對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影響：心理學碎片化、去差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主體、去意向化**

當代心理學亦處於上述理性主義思潮的背景視域下，因此「離根理性」亦反映在當代心理學發展的軌跡中，此種反映不但是從源頭影響了心理學研究的每一個分支而形成了獨特的現象：「心理學碎片化」、「去差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主體」、「去意向化」，同時這些獨特的現象彼此相互形成一股強化網絡，此種網絡力量強大，幾乎說服後學者相信擁有此類特性的學問才夠格被稱為心理學。以下分別論述上述現象的概念、形成的可能機制，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樣貌。

當代心理學傾向戴上理性主義的眼鏡，將人的整體活動，分析降解成為實證主義式的行為與神經活動；將人與他人及環境的整體經驗，降解成為能被理性掌握與切割的諸如「情緒」或「溝通」等彼此分離的研究主題，導致「心理學的碎片化」，而非探討諸種

心理功能如何作為一個「系統性」的整體整合運作，與自然與社會環境彼此互動。當代心理學中，完形心理學與完形治療學派即由此開展對於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的批判（Wertheimer, 1923）。

另一方面，在心理學碎片化的影響下，個人的特性與其獨特的發展與經驗內涵，即被從他身上撥離，形成了「去個人化」的特性，讓心理學的探討對象變成普遍扁平的「一般的」、「典型的」人，而非獨特的、具有特殊經驗與發展內涵的「您」。由此，產生了兩個看似互相矛盾，但卻實為一體兩面的現象，即同時由於強調人的生物性與機械性，將具有不同發展歷程與個人史經驗的「個人」當成不具差異化的、普遍的「機械人」，形成了當代心理學理論中普遍含有一個「典型人」的預設，這樣的結果造成心理學的「去差異化」；另一方面，在面對社會與個人的發展時，由於剝離了個人的經驗與主觀感受，因此形成在面對社群與社會時，採用上述「典型人」的立場，思考並賦予個人所具有的社會法律地位，並強調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此種作法好處在於保障了個人的界限，使得個人不易受到社會與政府權力的侵害，然而，在實際的個人生活中，由於強調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使得個人與社群及所屬社會文化的關係，僅僅剩下以個人為出發點的權利義務關係，讓人進一步由其所屬的社群中剝離開來，使得離根式的個人主體與環境的關係功利化，而忽略了這個主體在其社會網路脈絡中可能的其他原則與發展脈絡，最終將這種個人與社會彼此鑲嵌的整體網絡系統關係，簡化成為簡單的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利益加減關係。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當代心理學中的「詮釋現象學派」，即由此開展理論核心，希望重拾對於個人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發展時間與具有差異化的、具有脈絡化的「人」的重視。然而，「詮釋現象學派」卻又同時受到西方文化系統的發展脈絡影響，造成偏向實證式的語言與行為資料蒐集，這便造成了「詮釋現象學派」過度重視個人經驗與現象場的實際例證，而較少將實際例證推向抽象層次的問題，因此某種程度上可能造成人的個人經驗與其抽象自我概念分離。此種問題使得「詮釋現象學派」有機會仍然落入實證主義的、對人的離根式思維。

但無論如何，同時對人進行去差異化處理，又在面對社群網路系統時過度強調個人化的結果，使得個人的「意向」（intentionality）也失去了作用的脈絡與意義，於是個人的意向與其影響也逐漸在當代心理學探討的主題中遭到邊緣化的對待。個人的「意向」是引領個人發展從一種被決定的狀態，轉變成有意識地自主引導個人發展的關鍵，人的發展轉變，有賴於在個人獨有的個人史與脈絡中不斷修正與證成自性的發展趨勢。但是在上述的文化脈絡中，由於個人被視為「普遍的、去差異化的典型人」，因此使形成個人意志的發展脈絡斷裂潰散；另一方面，「普遍的、去差異化的典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因此被簡化成為權利義務的簡單計算，使得許多行為的道德意義被摘下桂冠，這樣的結果，實際上使得人的意志的價值也遭到了邊緣化。這樣的心理學，無疑地，在心理學與心理治療及諮商心理之間產生了斷裂。

上述特點進一步地反映在心理治療領域，更形成實務上的獨特挑戰，讓本來應該關注「人與其處境」此一「整體」，進而促進案主整體發展趨勢改變的心理治療，因為「離根理性」的「片面性」，將「人」學科化、碎片化，使得本來應該面對「人這個整體」的心理治療，轉化成面對「疾病」或「失能」的症狀診斷與症狀治療。此一特殊挑戰，反映在當代心理學家對現行「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第五版」（以下簡稱 DSM-5）上，形成對於具有身心困擾的案主「疾病化」的趨勢。由此，人的整體經驗與主觀感受遂被視為可降解分析的、具有認知特徵的認知活動；並將人與世界的關係切割成為物理、化學、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各個獨立的學科進行實證主義式分析。而此種將「人」降解轉化為「疾病」的觀點，實際上西方文化獨有的，是離根理性的產物（Watters, 2011）。

上述三個獨特的挑戰，進一步流變成為在協助案主面對本身獨特挑戰時，依循學科專業化、碎片化的原則，將案主的整體問題加以切割，轉化成諸如「診斷、藥物（精神醫學）；認知、行為（臨床心理）；物理、職能（復健）；家庭與學校社區問題（社工、教師）等專業領域的問題，如此更使得本就陷入困境的案主更加莫衷一是。如此一來，心理治療的整體關照與可能策略即出現了全面性的不足。更為嚴重的是，使得人作為一個獨特心理本體的地位遭到專業化的侵蝕。此一弊端全面性地反映在心理治療的整體上，包含但不僅限於治療者與案主的關係、案主概念化、心理衡鑑、診斷，乃至於治療策略與具體技巧上。為了詳細說明上述論點，本文將在第肆節列舉一個團體心理治療的先驅實徵研究，具體說明。

### 參、本土心理學發展的可能解方：儒釋道文化體系中人與環境互動動態系統觀

本土心理學自民國 60 年代開始，即逐漸蓬勃發展。最主要的驅動來源來自對抗西方的學術霸權，希望能夠奠基在本土文化體系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對於人以及世界的認識。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發展本土心理學理路時尤應進一步探究與借鑑西方文化的發展及其局限，方能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土文化體系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貢獻。

本文使用相當長的篇幅，對西方文化系統進行了發展脈絡的文化分析，並且說明此一流變對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影響。接下來則主要著重說明與西方文化系統極為不同的中華文化系統。事實上，如果要清楚地闡明整個中華文化系統，所需的篇幅與對於筆者能力的要求，將遠遠超出本文的篇幅，因此本文僅能在此以一個概括性的統整概念，描述中華文化系統中，筆者認為與本主體最為相關的核心概念。

儒釋道文化體系的系統觀，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中，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詮釋非常獨特。既不採行 Charles Taylor 所描述的西方離根理性式的自我異化過程，也不採行極

端機械決定論的看法，將人視為純粹被動地接受外在條件的看法，更反對 Freud 式的潛意識決定論，將人視為被動的潛意識載體。

與上述西方文化系統的觀點相反，儒釋道文化體系均強調人與環境互動的動態系統觀，例如在儒道文化體系中將人與世界視為「天人合一」的整體。在此一觀點下，不把個人視為與世界分離的個體，而是把個人與世界視為無法彼此脫離、持續動態互動的整體系統。兩者之間的分界，與其說是模糊地彼此參雜，更好的詮釋應該是隨著時間與情境而不斷動態改變的。亦即，將人與環境視為一個透過動態互動，連結共構生成的龐大複雜系統。在這個整體的動態系統中，人為一個主要的子系統，環境則為另一個主要的子系統。這兩個子系統在不彼此產生互動時，可視為兩個獨自運作的複雜系統，但在大多數時候，兩者彼此互動鑲嵌，構成一個更為龐大的系統，此時兩者均可被視為這個更為龐大系統的子系統或次系統。因此，人與環境何者為主，何者為次，端視詮釋者所欲詮釋的視角與所欲詮釋的主體而定。且當吾人將此一整體系統當成分析的對象時，各系統與其中的動態機制，仍然是可以被認識與理解的。

例如：以道家為基礎科學理論的中醫，強調人與環境彼此調和，甚至可以利用天時，佐助疾病的預防與診治。其中最為著名且現今依然廣為應用、多有實踐的，莫過於「三伏貼」療法的施行。「三伏貼」的理論與應用由來已久，但最早見諸文字是在清代張璐（1699）《張氏醫通》：「諸氣門下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應有不應。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效。方用白芥子淨末一兩。延胡索一兩。甘遂、細辛各半兩。共為細末。入麝香半錢。杵勻。姜汁調塗肺俞膏肓百勞等穴。塗後麻瞽疼痛。切勿便去。候三炷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塗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

在這篇記述中，可以看到起初發展三伏法，是為了解決一個具體的難題「諸氣門下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應有不應』。」亦即使用灸法，施術於肺俞、膏肓、天突三個穴位來治療喘與冷哮。然而此法的施行卻有時有效、有時效果不彰。按照現代西方科學的思考進路，要解決這個難題，很可能會展開方法學上的細緻分析，諸如從藥材成分、施術程序、案主的遺傳表觀型態等方面著手。然而中醫由於思考理路的差異，則另闢蹊徑，提出為何有時有效，有時成效不彰的重要影響因子，是由於「天時」不配：「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效」。因此，最終「三伏法」必然搭配節氣施行。

上述例子中，中醫在進行人體健康調理時，將環境的動態特質納入考慮。此時並不僅僅將環境作為一個影響人體系統結果的因子，相反地，中醫將環境視為與人體不可劃分的整體系統。因此人體本身與他所處的環境被視為一個緊密互動不可分割的系統，所以在進行調理與治療時，亦需要考量與參照體外環境的狀況，使用一個鉅觀整體系統性的思考來進行療癒。

儒家作為儒釋道文化體系中，最為入世的理論系統，儒家將環境子系統更為具體地以人與其所處的社會網絡脈絡為核心，闡發儒家的世界觀。例如徐進等人（2019），即提

出儒道共同的淵源《易經》，本身就隱涵了人與環境互動共同形構人的處境。

此外，在佛家認識論中，著名的六根六塵六識論述，亦分析「六識」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意識與概念這幾種個人的主觀感知覺，是由人的生理結構「六根」，與相應的環境刺激「六塵」，彼此交互作用後方才產生的，因此從本體上，亦是肯定了「六根」（人之結構）與「六塵」（環境刺激）彼此交互作用（人與環境動態互動）作為創生「六識」（結果／現象）的機制（陳家成、林杜娟，2002）。

以上例證，均為儒釋道重要的核心概念，如果將其抽象化與理念化，不難看出儒釋道文化體系對於人與環境的關係，雖然在論述所想要解決的問題上、論述的開展上、與本體論起源上彼此相異，但在形式上卻擁有相當的一致性，均肯認人與世界彼此互動、鑲嵌而必須被視為一個更大的整體系統。

## 肆、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一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 一、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本文論述之可行性

本研究旨在以一個簡單小型的實徵研究，來具體說明既有心理治療的問題，並提出以人與環境互動系統觀為核心的可能解方，因此，在選取本研究的議題時，最好具有：已有既有心理治療課程可以代表離根理性式的治療程序、議題本身最好能彰顯人與環境互動的特性、能根據人與環境互動系統觀對議題本身提出不同的見解，並能合理轉化為新的治療程序。筆者自身的經驗中，能同時滿足上述條件的，以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治療以及毒癮治療為首。本研究以可接觸性為原則，在此選取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治療作為本研究先驅性實徵研究的主題。

這是因為，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治療已有行之有年的家長訓練團體，例如IMPACT 課程。而此類心理治療底下的原則均依循行為主義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所產生的變體，並且多聚焦於如何教導自閉症幼兒的家長因應與改善幼兒之自閉症症狀；其次，自閉症家長是所有具有特教需求的兒童中，親職壓力最重且最容易出現伴侶問題的族群，因此使得這個主題不僅僅是與自閉症幼兒相關，更具有廣泛的系統性人際因素；第三，由於上述廣泛的系統性人際因素，使得人與環境互動系統觀，能從最基礎的心理治療的總體目的、執行方法、具體技巧等處均能著力。故此，本研究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一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 二、自閉症家長所面臨的挑戰：源於幼兒特殊性的親職壓力

自閉症光譜疾患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以下簡稱 ASD), 簡稱自閉症, 是一種廣泛性的兒童發展障礙。DSM-5 敘明此類兒童可能同時或獨自具有: 持續的社交溝通及社交互動的缺損 (包含「社會—情緒相互性」的缺損、「用於社交互動的非語言溝通行為」的缺損、「發展、維繫及了解關係」的缺損); 並且常表現出侷限、重覆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 且在兒童發展早期即出現, 無法以智能發展障礙作更好的解釋, 並且在嚴重程度上, 足以引起臨床上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方面的顯著功能減損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4)。

由於上述缺損的綜合效應, 尤其是社交溝通與社交互動的缺損, 使得 ASD 兒童難以與家長雙向且適切地表達自身的需求, 同時在情緒察覺與情緒調控上, 也因為侷限、重覆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 使 ASD 兒童做出許多不適宜的行為, 例如在百貨公司執著地上下搭乘數十次手扶梯, 且若打破其執著行為, 更可能出現劇烈的哭鬧, 上述種種行為都對家長教養造成極大的親職壓力 (parental stress)。

親職壓力是指在主要照顧者 (main caregiver) 身上出現, 一組與親職角色相關的、非特定 (non-specific)、持續 (persistent)、顯著 (significant) 的挑戰 (Pisula, 2011)。而在親職壓力研究中, 許多研究一致地發現, 與養育正常發展 (normal developed, 以下簡稱 ND) 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相比, 養育具有特教需求 (special needs, 以下簡稱 SD) 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普遍承受更高的親職壓力 (Blacher & McIntyre, 2006; Dabrowska & Pisula, 2010)。Webster 等人 (2008) 以親職壓力量表 (Parental Stress Index) 測定 ND 兒童主要照顧者與 SD 兒童主要照顧者, 在親職壓力主觀感受上的差異, 發現 40% 的 SD 兒童主要照顧者, 親職壓力量表分數高於常模的 85%, 顯著地高於 ND 兒童主要照顧者的狀況。顯示養育 SD 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承受了較大的親職壓力。與此同時, SD 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在生活適應與壓力調適上, 也呈現更多適應不良的狀況 (Estes et al., 2009; Estes et al., 2013)。

然而, 養育各種不同特教需求的兒童, 主要照顧者承受的壓力也不盡相同 (Blacher & McIntyre, 2006; Dabrowska & Pisula, 2010; Estes et al., 2009)。其中, 又以養育具有自閉症發展疾患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所承受的壓力更為巨大, Hayes 和 Waltson (2013) 進行後設分析研究 (Meta-analysis research), 發現養育 ASD 兒童的主要照顧者與養育以及其他諸如唐氏症、智能不足、肢體障礙、其他發展遲緩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相比, 跨文化的普遍承受更為龐大的親職壓力、更差的主觀生活品質, 且更常出現焦慮與憂鬱相關的壓力反應 (Hayes & Watson, 2013)。特別的是, 養育 ASD 兒童, 也對伴侶關係產生特殊的挑戰。相比於 ND 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及其他發展遲緩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ASD 主要照顧者關係更為緊張, 伴侶之間的主觀滿意度更低, 彼此之間需要更有技巧、更為緊密的支持, 才能維持穩定的伴侶關係 (Brobst et al., 2009; Sim et al., 2016)。而且, ASD 主要



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不會因為兒童逐漸成長而減少，意即，ASD 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穩定長期地處於較高的狀態 (Alliket al., 2006; Estes et al., 2013)。此種長期的高壓力暴露，對 ASD 主要照顧者而言也會影響其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 (HPA Axis) 的表現，使得 ASD 主要照顧者承受較高的心血管、免疫、與壓力相關疾病的風險 (Saxbe et al., 2017)。

因此，針對養育 ASD 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實施積極的心理介入，在個人心理上 (Chiang, 2014; Lunskey et al., 2017)、伴侶與社會關係上 (Bluth et al., 2013; Brobst et al., 2009; Garcia-Lopez et al., 2016; Sim et al., 2016)、與壓力相關的生理健康上 (Allik et al., 2006)、親職效能上 (Lau et al., 2016; McIntyre, 2013) 均具有重要正向意義。

儘管上述研究顯示養育 ASD 的主要照顧者承受龐大且多元面向的壓力，然而，目前針對 ASD 主要照顧者所設計的團體治療程序，大多將主要的治療目標放在訓練 ASD 子女或教導主要照顧者如何有效地教育 ASD 子女。例如，「Joint Attention, Symbolic Play, Engagement, and Regulation」的 JASPER 治療模式 (Kasari, 2006)，以及「Improving Parents as Communication Teachers」的 ImPACT 父母訓練計畫，均強調在自然情境下，根據 ASD 子女出現的有限行為表現，選擇適當的介入策略，透過與主要照顧者互動，擴展並增進子女社會溝通技巧。可增進的核心能力包含：社交主動性 (social engagement)、語言能力 (language)、社會模仿 (social imitation)、遊戲 (play) 等能力。期待透過課程練習，讓主要照顧者成為子女的治療師，一起陪伴 ASD 子女走過漫長的療育旅程。

事實上，這些教育方案與訓練計畫，背後多數存在著「只要正確妥善地傳遞 ASD 子女的教養知識，其他諸如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壓力、伴侶關係、生理健康等等，通通都會隨之改善」這個隱而未說的基本假設。而這個假設的背後，更是預設了主要照顧者都能透過知識上的訓練「成為子女的治療師」。但是，要想成為一個有效能的「治療師」，除了擁有相關的知識以外，治療師自身擁有穩定的情緒，能妥善因應自身的壓力，也都是其中的關鍵。此類專注於給予主要照顧者養育知識的療程，顯然並非為此設計。

與此相反，基於上述對於 ASD 主要照顧者壓力的研究分析，可以理解 ASD 子女主要照顧者的壓力擁有許多面向，往往不是單純提升對 ASD 子女的養育知識或單純協助主要照顧者接受現況、承諾改變，便能將 ASD 主要照顧者所面對的問題通通解決的。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團體治療方案，整合：1.對於 ASD 子女心理與發展特殊性的理解；2.主要照顧者對於家有特殊需求子女的自我接納；3.透過團體動力，構成支持體系，協助主要照顧者因應與調適相應的親職壓力，並且進一步以此為出發，重新整合既有的伴侶與家庭系統等面向，使每一個面向都能指向促進與恢復參與團體家長的系統性動力，故而能整合地、從多面向協助養育 ASD 主要照顧者改善其生理心理適應。

### 三、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一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故本研究的心理治療主軸，首先從心理治療的對象與意義即有所不同。傳統針對自閉症兒童症狀改善的家長團體，專注於教導家長如何詮釋與教養自閉症兒童，因此整體的治療目標是：使自閉症兒童逐漸減少不適切的行為，並以適切的行為取代。另一方面，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更進一步將整體的治療目標設定為：藉由輔助家長正向重建與自閉症幼兒的關係，來重新詮釋育兒的意義，並以系統觀協助家長，重新檢視整個伴侶與家庭人際系統如何受到養育自閉症兒童的獨特挑戰影響，並引導家長重塑整體系統動力，將整體系統的動能引導回家長身上。因此，在治療的對象上，傳統親職團體，將治療對象視為家長個人或自閉症兒童的不適切行為，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之治療對象，毋寧說是整體系統本身。而在具體執行與治療技巧上，傳統親職團體大量應用行為主義促使家長習得以行為分析為基礎的行為改變技術；而在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中，則廣泛應用關係重建、想像技巧、接觸情緒、引導評估系統動能等多元且更重視感性與體驗的技巧。

####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親職團體：以系統觀重新定義自閉症治療的目標與治療方案，並以先驅實徵資料檢驗治療效果。

本研究思考轉換自閉症兒童的治療目標，將原本僅以自閉症兒童症狀治療為主的目標導向，重新以家族系統觀進行重整，本研究認為應該以整體家庭系統為單元，以協助主要照顧者重新詮釋孩子所面臨的特殊挑戰為主軸，重新理解孩子的特殊教育需求對整體家庭系統動力的影響，並且以團體治療歷程協助主要照顧者重建整體家庭系統的支持能量，藉此達成整體系統性的修復，最終協助主要照顧者達成整體心理健康的提升。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與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相關文獻、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分述如下：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二梯次，每梯次為期三個月，10 節次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案。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

1. 探討以「以理解、接受與重新詮釋既定幼兒現狀輔以伴侶與家庭系統的再整合為主軸的團體療癒歷程」的自閉症親職團體療癒成效。
2. 由此先驅研究中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心理治療方案。
3. 本研究比對既有臨床心理治療方案，與接受此方案的研究參與者在（1）憂鬱程度；（2）焦慮程度；（3）親職壓力；（4）一般身心健康狀況之差異。

## (二) 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參與本方案之親職團體的研究參與者，在參與團體後，對比於既有臨床方案，整體而言在(1)憂鬱程度；(2)焦慮程度；(3)親職壓力；(4)一般身心健康狀況等四大層面上，均有正向的改善。

##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案條件、招募方法及數目如下述：

### 1. 收案標準及招募研究參與者

- (1) 自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3 月 1 日止，針對 5 至 7 歲，於醫院精神科、身心科等相關科部確診或疑似診斷為自閉症光譜疾患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 (2) 主要照顧者年齡 $\geq 20$  歲並 $\leq 70$  歲，不分性別之自閉症光譜疾患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 (3) 收案人數：共 28 人，隨機分派實驗組一組，共 14 人；控制組一組，共 14 人。

### 2. 排除條件 (exclusion criteria)

- (1) 參與對象患有精神疾患診斷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 (2) 無法同意或配合研究進行者。

## (四) 研究步驟與進行方式

本研究共執行二梯次團體方案，每梯次為期三個月，包含 10 節次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案，固定每周一次，一次 1 節，約 50 分鐘，執行步驟如下：

1. 本研究邀請經由醫院兒童精神科、身心科或相關科部門診，確診或疑似診斷為自閉症光譜疾患 (ASD) 兒童與青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接受為期三個月，10 節次的親職團體方案。在團體方案執行前及團體方案結束後，分別請研究參與者填寫分別請主要照顧者填寫：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華人健康量表、家庭功能量表、親職壓力量表。以蒐集主要照顧者在各項指標上的前後測表現，並以之與等待隊列控制組的得分進行比較，以表徵團體治療的效能。
2. 收案對象為自民國 106 年，至合作醫院兒童精神科門診看診後，研究執行時(民國 109 年) 為 5-7 歲，確診或疑似自閉症光譜疾患幼兒與兒童之主要照顧者，由上述收案對象中，徵求有意願進行親職團體治療之主要照顧者(介於 20 歲至 70 歲之間，共 48 人)，由研究人員依亂數表抽取、研究參與者無法自行選擇組別之原則將研究參與者隨機分派至治療組與等候隊列控制組中，輪流進行

為期 10 週的團體治療。

3. 分別於在實驗組及對照組執行團體方案前後，蒐集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華人健康量表、家庭功能量表、親職壓力量表，並以基本資料問卷紀錄個案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家庭背景等相關受試者變項，作為檢驗團體療效的實徵資料。
4. 本研究結束後，針對團體參與者進行 debriefing，同時保證研究資料不可外洩。
5. 為考量參與研究者隱私，本研究並不使用兒童與青少年作為對象，主要照顧者年齡則均為成年人，且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均需妥善保管並負保密責任，且不可用於本研究之外任何用途。
6. 本團體方案課程表如表 1。

表 1

親職團體課程表

次數	既有以 ImPact 為基礎的課程（控制組）	本研究課程（實驗組）	實驗組設計意圖
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團體治療關係</li> <li>2. 了解治療架構</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關係</li> <li>2. 了解治療架構</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團體動力與投契（raport）關係</li> </ol>
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團體治療關係與團體動力</li> <li>2. 自閉症光譜疾患症狀與相關心理病理學知識</li> <li>3. 討論家中環境擺設如何促進互動</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團體規範</li> <li>2. 評估 ASD 兒童在 ASD 症狀表現上的受損嚴重程度與個別性質上的差異</li> <li>3. 協助家長了解如何由例行性互動中理解與教導孩子</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藉由團體成員彼此互動，促進團體動力成形</li> <li>2. 評估與了解不同成員家中 ASD 孩子的狀況</li> </ol>
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協助家長了解為何需要不同介入技巧</li> <li>2. 教導介入技巧以增進孩子互動能力（如模仿）</li> <li>3. 教導家長如何調整說話方式增進語言使用</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持續評估 ASD 兒童個別差異</li> <li>2. 評估 ASD 孩童受損情況與家庭環境如何互動</li> <li>3. 協助家長辨識潛藏在家庭動力底下的否認情緒</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評估與了解 ASD 孩子的狀況</li> <li>2. 了解 ASD 孩子與整體環境如何交互影響，形成循環</li> </ol>

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教導如何增進語言接受和表達能力</li> <li>2. 教導如何運用提示技巧增加語言自發性</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評估 ASD 孩童受損情況</li> <li>2. 與家庭環境之互動如何形成對家長之獨特壓力</li> <li>3. 協助家長辨識此一壓力所帶來的衝擊</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評估與了解 ASD 孩子家庭與環境互動所形成的壓力循環機制</li> </ol>
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教導如何增進社會模仿和遊戲技巧</li> <li>2. 教導父母如何運用提示技巧增加相關能力自發性</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開始引導家長接觸阻絕的自我感受</li> <li>2. 藉由協助家長重新審視孩子對他的意義及情感／心靈聯結，協助家長重新定義與重拾對孩子的正向感情</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引導家長完整經驗自己在接納孩子是特殊兒童時所感受到的壓力與情緒</li> </ol>
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教導孩子情緒背後原因</li> <li>2. 教導如何處理孩子情緒問題</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藉由重新定義與重拾對孩子的正向感情，協助家長整合想法、情緒與行為，重新建構對孩子的教養目標</li> <li>2. 練習自主建構養育具有特教需求對家長的意義</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引導家長與孩子的正向情感連結，整合自己的想法、情緒與行為，以促進家長建構關係中的自性。</li> </ol>
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教導家長如何使用互動和直接介入技巧增進社會溝通</li> <li>2. 教導父母何時使用不同種類的技巧</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持續引導家長練習整合不同的情感</li> <li>2. 逐漸由對自我經驗的整合，擴展到自我與孩子的互動（教養經驗）</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延續上次，持續引導家長整合自己的想法、情緒與行為，以促進家長建構並體驗自性不依情境所動的特性。</li> <li>2. 以一致、不依情境所動的自性作為歸向，整合與重新詮釋教養經驗。</li> </ol>

八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協助解決如廁訓練和飲食問題</li> <li>教導如何安排早療和轉銜問題</li> <li>教導處理家庭成員對特殊兒不同步調問題</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持續深化自我與孩子的正向互動，並由此逐漸開始促使家長反思之前教養中所遭遇的阻礙，及其中意義</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延續上次課程，以一致、不依情境所動的自性作為歸向，整合與重新詮釋教養經驗。</li> </ol>
九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增加對教育轉銜和不同學習環境適應問題的討論</li> <li>如何利用手足或家長成員促進人際互動技能</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藉由團體動力，反思整體家庭系統對於養育者—孩子之影響</li> <li>協助家長建立新的家庭系統動力循環</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建立新的家長—孩子的家庭互動循環</li> </ol>
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如何善用 ASD 固執性或儀式化行為</li> <li>如何增加 ASD 技巧類化能力</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引導家長自我充能並建立自我引導標準，以在日後設置引導自我的原則</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促進家長以跨越情境，具有一致性的「自性」，作為自我評估家庭互動循環的標準</li> </ol>

#### (五) 依變項測量及評估工具

- 本研究採用「貝氏憂鬱量表—第二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 BDI-II)，測量研究參與者憂鬱程度。共有 21 組題目，每組包括 4 個句子，依憂鬱的特定症狀之嚴重程度排列，適用年齡為 13-80 歲，用以評估受測者的憂鬱程度作為診斷及處置參考。量表要求受測者至少應有小學 5-6 年級以上的閱讀能力。填表時間約為 10 分鐘，在兒少及成人精神醫學研究中，是經常被使用的診斷工具。
- 本研究採用「貝氏焦慮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測量研究參與者焦慮程度。本量表藉由研究參與者自我陳述的方式測量焦慮的嚴重程度。共 21 個項目描述焦慮症狀，並用「完全沒有困擾」、「輕度困擾」、「中度困擾」、「重度困擾」分別計 0、1、2、3 分，再依量表總分的範圍來解釋研究參與者自我陳述的焦慮強度。適用年齡為 17 歲以上。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 為 0.85-0.93；重測信度 (時距為 1 週) 為 0.75。
- 本研究採用「華人健康量表」(CHQ-12)，測量研究參與者一般身心健康狀況。本問卷由鄭泰安與 Williams (1986)，以 Goldberg 一般健康量表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為基礎，參照本國文化修正題項與翻譯，應用於三組不同樣本後，再經由多次區辨功能分析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篩檢出 12 題適當的問題，組成適用於本國文化的精簡版本 (Cheng & Williams, 1986)。本量表為 Likert 氏自陳四點量表，總計 12 題，共有 2 題反向計分題。計分時，每一題項中，「一點也不」、「和平時差不多」兩選項均計為 0 分；「比平時較覺得」或「比平時更覺得」，計為 1 分，故計分最高為 12 分。得分愈高表示心理健康程度愈糟 (Goldberg, 1972; Goldberg & Williams, 1988)。總分反映由三個因素 (身體症狀、焦慮／擔憂、憂鬱／家庭關係不良) 構成的一般心理健康程度，較為寬鬆的健康與不健康之切截分數為 5 分 (Chong & Wilkinson, 1989)。在建構效度上，本問卷題目以因素分析的方式可將之分為三個因素：身體症狀 (somatic symptoms)、焦慮／擔憂 (anxiety and worrying)、憂鬱／家庭關係不良 (depression/ poor family relation) 包含了從身體狀況、心理狀況、及重要人際關係的心理健康向度，符合本問卷初始的設計構念；在信度上，本問卷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79，具有良好的信度 (Cheng et al., 1990)。

4. 本研究採用「親職壓力量表」(PSI/SF)，測量研究參與者親職壓力程度，共 36 題，以五點量尺計分，所得分數對照百分等級常模可得三個分量表與總量表之百分等級，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親職壓力分布狀況。分為父母困擾、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兒童三個分量表。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介於 0.86-0.91 之間，總量表達到 0.95。
5. 本研究採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PGAR) 共 5 題，以 3 點量尺計分，了解研究參與者的家庭功能與支持狀況 (Smilkstein et al., 1982)。中文版 Family APGAR 已經驗證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hau et al., 1991)。計分方式：「很少」計為 0 分；「有時候」是 1 分；「經常」計為 2 分。5 題共 10 分。本量表以 5 題項分別表徵家庭適應度、家庭合作度、家庭成長度、家庭情感度、家庭融洽感。5 題最高可能得分為 10 分，若總分 7 至 10 分：表示家庭功能無障礙；總分 4 至 6 分：表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礙；總分 0 至 3 分：表示有重度家庭功能不足。

##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受試者變項結果：**參與研究的家長在學歷，社經地位與家長年齡及幼兒年齡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性別上，僅有年齡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性別上，28 位參與者中僅有 1 位為男性，在家庭角色中，2 位為奶奶與外婆，1 位父親，其餘 24 位均為母親。顯示至少在參與自閉症兒童治療方面，仍以女性為主要角色，且以母親佔多數。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參與者在婚姻狀態中，有 6 位離異，1 位未婚，4 位兩地分居。此種多元

狀態的婚姻關係，除了社會本身對婚姻與家庭的改變以外，亦可能與養育自閉症兒童對伴侶關係造成的壓力相關。

本研究使用自填量表在團體進行前、後皆：1. 以 BDI 量表測量參與者憂鬱程度；2. 以 BAI 量表測量焦慮程度；3. 以親職壓力量表測量親職壓力；4. 以華人健康量表測量一般身心健康狀況；5. 以家庭功能量表測量家庭功能，以檢驗團體療效的實徵效果。首先以混合模式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全域 (over-all) 效應，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雙因子交互作用顯著，則進一步以獨立樣本或重複量數 t 檢定分析單純主要效果。

**依變項結果：**經過新型態的團體治療後，在 BDI 上，兩組均呈現低憂鬱分數，故兩組無顯著差異（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26)}=0.18$ ， $\alpha=.675>.05$ ， $\text{partial}\eta^2=.01<.06$ ）；

研究參與者在 BAI（兩因子交互作用顯著  $F_{(1, 26)}=5.40$ ， $\alpha=.03<.05$ ， $\text{partial}\eta^2=.17>.14$ ；單純主要效果當組別固定為實驗組時， $t_{df=13}=1.62$ ， $\alpha=.13<.05$ ）與華人健康量表上（兩因子交互作用顯著  $F_{(1, 26)}=6.80$ ， $\alpha=.02<.05$ ， $\text{partial}\eta^2=.207>.14$ ；當組別固定為實驗組時，單純主要效果  $t_{df=13}=4.36$ ， $\alpha<.01$ ）均顯著優於傳統核心反應訓練組。

但在反映親職壓力的親職壓力量表（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26)}=2.05$ ， $\alpha=0.17>.05$ ， $\text{partial}\eta^2=.07<.138$ ）與反映客觀家庭功能的家庭功能量表上（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26)}=.55$ ， $\alpha=.46>.05$ ， $\text{partial}\eta^2=.02<.06$ ），兩組無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新型態的團體心理治療雖然無法直接改善持續存在的親職壓力以及客觀的家庭功能，但卻能透過協助參與者減輕上述客觀壓力伴隨而生的焦慮，從而提升研究參與者的整體健康程度。

總和而言，本研究邀請養育自閉症兒童的家長，組成家長團體，根據上述取徑引入整體系統觀，安排一個系統的整體性團體治療方案，構成以理解、接受與重新詮釋既定幼兒現狀輔以伴侶與家庭系統的再整合為主軸的團體療癒歷程協助參與家長，以整體的系統性動力作為協助家長面對養育自閉症兒童獨特挑戰的力量，將傳統臨床針對自閉症症狀的治療目標重新導向成為以整體家庭系統為治療目標，重新形塑家長所處的系統趨勢，以協助家長及其家庭共同協作，繼而減輕家長焦慮、憂慮與親職壓力，最終提升家長一般健康程度。

研究結果除了反映憂鬱狀態的 BDI 結果，由於兩組研究參與者均顯示為低憂鬱狀態，因此無顯著差異外，其餘均符合研究假設，顯示此種將治療目標重新導向至整體系統的心理治療能有效改善養育自閉症家長的焦慮、親職壓力以及整體心理健康程度。

本先驅性實徵研究結果顯示，此種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不但在心理治療的目標、心理治療的對象、心理治療的具體技巧上均有所拓展，且透過先驅實徵研究顯示，此種心理治療的整體效果，能夠有效地透過與傳統親職教育團體相異的路徑，以不同的方式協助養育自閉症的家庭。



## 伍、討論

上述實徵研究的成功，實際上正是根源於對人的主體觀不同的想像。此種對人的理解，實際上是將人視為人與環境彼此交互的互動系統中的重要分子，反映在儒道文化系統中即是「天人合一」的概念。對心理治療的意義在於：突破原先僅以個人為侷限的心理治療目標，將所有的心理治療均為系統中的「高層調控」，意即使用系統中較為高階組成元素獨有的行為方式，調控整體的系統結果。例如，如果把客機中的機長與機組成員視為整台客機系統的高階組成元素，則唯有此種高階組成元素能夠靈活地應對各種突發、難以事前預期的飛行狀況，此時，系統中的低階組成元素，例如自動駕駛儀、液壓系統、電機系統等等組成元素，均由高階組成元素（機長）導引其共同運作的方向。而在人類心理上面，人類在面對自身獨特的環境與個人史時，作為高階引導組成元素的，即為個人的意向（intentionality）。

然而有了這樣的高階調控形式，是否就可以完美地描述人類心靈呢？事實上，系統的低階組成元素仍然具有關鍵且不可或缺的存在意義。在系統組成元素缺乏冗餘，或故障、缺失時，高層調控的效益是具有侷限性及情境特定性的。譬如經驗再豐富的機長，也難在低空反應時間極短的情況下，挽救失去所有引擎的飛機於毀滅。而此時，低階系統元素完整性的保障，則有賴於飛行工程師的專業知識與平時制度完善的保養體制。

因此可以說，低階組成元素提供整體系統的基礎，當低階組成元素具有缺陷時，高階調控策略須隨之改變。而高階調控則是根據低階組成元素作為基礎，發揮引領整體系統表現或系統趨向的功能。

唯有以此動態的系統觀點反思人性，意向的意義才能既不被過度低估，亦不被過度強調其有效性地、中正地探討。如此，對應於整個心理治療整體，低階系統組成元素的保養與修護即屬於生物學、基礎醫學、精神藥物學的範疇。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個別心理治療、家族治療則屬於高階調控的範疇。

而本文所建議的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心理治療，應該是兩者俱不偏廢，將各種足以影響個人最終心理現象的系統組成元素，加以統整理解，使得目前散亂、各自碎片化的心理治療相關領域有所歸依、彼此整合，並以系論來貫穿理解個人「生物」—「心理」—「社會」的整體系統性治療。

此外，就心理治療的實際應用層面而言，當「系統」的定義得以擴張，則心理治療的服務對象，將可能在以個人為目標的心理治療失效時，逐步隨系統的擴張，而重新定義心理治療的服務對象，從個人到家族，從家族到學校，乃至於從學校到整個社會。

實際上，本文所提及的三項當代心理學的特點，西方文化系統中亦均有學者有所意會並曾加以批判，例如，心理學中的詮釋現象學派，反對心理學的理性實證趨向，反思「心理學碎片化」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因此特別強調心理學家反映案主個人的現象場的

完整性。然而，過度地強調個人現象場的完整性，卻落入七十億人口就必須有七十億種心理學的困境；

另外，在探討人與社會的關係時，以 Parsons 結構功能論為起始的 Luhmann (1995) 社會系統論甚至直接將「人」視為「社會系統」的背景，並強調「社會系統」的自動性與自續性 (autopoiesis)，因此被學者稱為「後人類世代」的社會學理論 (Lovasz, 2018)，可以說是把「去個人化」的離根主義傳統推進到了極致。Lohmann 的社會學理論有其獨特的背景脈絡，在社會學中擁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把人類「社會」當成研究對象，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卻是「人自身」(Human, myself)，因此，不能像研究其他自然物品或人造物那樣，將人自身從人的身上切割開來。畢竟，看著河中倒影，卻誤認為河中的水仙是自己的身影，是無法真正地理解人性的；而 Emmanuel Levinas 的他者哲學 (引自賴俊雄, 2014) 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當代存在主義如果走入極端，「在我之外，只是一片黑暗的虛無」。認為過度地強調以「我」為中心的西方文化系統，具有走向虛無化的危機；

另一方面，Taylor 以知識型的區分為主軸，討論「去意向化」對心理治療的影響，Taylor 在其哲學體系中，將人類認識世界的趨向區分為「自然主義的知識論」與「以理解為目的的知識論」(Taylor, 1989, 2001)。並且認為兩種知識論各有其適用的範圍，不能混用。然而，Taylor 在提出解決之道時，可惜並未能明確地提出一個有效替代離根理性的本體論。

事實上，此種本體論本身即存在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底層，從儒釋道文化系統中即可淵遠流長地看到它的肇興與演進。缺少了此種完全不一樣的本體論，雖然西方學者也能各自從不同角度上發現己身文化系統的缺憾，但卻無法統整一貫地理解這三個特點其實是由同一個對人的獨特理解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現象。

面對文化系統，必須根據多來源的文化系統作為學思泉源，以獨立的批判思考整理與開創文化系統。這是由於每個不同的文化系統都在其歷史發展的脈絡下，塑造了身處該文化系統之下，個人如何追求個人和集體福祉的方式 (Joshnloo et al., 2021)，因此每種文化都反映了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人們追求福祉的特定面向，這許多的面向就如同「瞎子摸象」般地，各自都有獨到之處，但也各自有所限制與偏頗。

因此，最終本文希望與讀者討論，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異文化體系衝突與競合中，不同文化系統彼此緊密接觸衝撞的頻率史無前例地升高，文化系統間的衝突對立亦愈加頻繁的情況下，文化系統彼此接觸時，除了彼此衝擊對立，是否還有另外的可行之路，能讓彼此迥異的文化系統兼容並蓄，共同創造嶄新的巔峰？

本文以為，真正能夠引導各個文化系統彼此尊重，彼此對話的立場應為：首先必須深刻理解不同的文化系統各自應對獨特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的特殊脈絡，而具有獨特發展軌跡，也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統，實際上就有如「瞎子摸象」故事裡的瞎子一樣，

相異文化系統發展出來的人觀、世界觀就僅僅是「瞎子所摸到的象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這裡需要特別留意，所謂的瞎子，並不僅指與己身文化系統相異的文化系統是如此，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系統亦是其中一名瞎子。

有此反躬自省的觀照為基礎，於是，世界的樣貌，便不用執著於既有文化的觀點而彼此衝突，而實有賴於以不同文化系統對於彼此的內涵、發展脈絡、獨特人觀與世界觀的具有涵容性的理解作為基礎，進行超越各個文化系統的超越性的想像與推理創見彼此對話融合，各自往前發展，才有可能攜手並進，從而窺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我們所共同生活的世界之樣貌。

### 參考文獻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4)。DSM-5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臺灣精神醫學會譯〕。合記圖書。(原著出版年：2012)
- Schluchter, W. (2014)。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林端譯〕。台大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8)
- 徐進、林俊德、張靈聰、夏允中(2019)。建構以《易經》為基礎的內在朝向式多層立體自我曼陀羅模型：「天人合一我」理論。本土心理學研究，51，277-318。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6](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6)
- 張家群、夏允中、黃光國(2016年8月14日)。從道德義務到自我修養-合攝儒釋道文化之雙軸多層次道德發展理論〔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6年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縣，臺灣。
- 張璐(1699)。張氏醫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09720#p296>
- 陳家成、林杜娟(2002)。尋求六根、六塵與九識在佛學與科學哲學上的共同定義。佛學與科學，3(1)，26-35。  
<https://doi.org/10.30162/BS.200201.0010>
- 傅佩榮(2020)。西方哲學之旅：啟發人生的120位哲學家、穿越2600年的心靈巡禮。天下文化。
- 曾國祥(2004)。現代性與自由主義的困境：泰勒的觀點〔論文發表〕。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南市，臺灣。
- 黃光國(2013)。社會科學的理路。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2014)。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2015)。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2018)。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2021)。破解科學主義的魔咒。本土心理學研究，55，101-239。
- 葉啟政(2019)。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三版)。

三民書局。

劉志洋 (2007)。泰勒論自由〔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

賴俊雄 (2014)。回應他者: 列維納斯再探。書林。

Allik, H., Larsson, J. O., & Smedje, H. (2006).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functioning autism.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4, 8-9. <https://doi.org/10.1186/1477-7525-4-1>

Barzun, J. (2001).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Harper collins.

Blacher, J., & McIntyre, L. L. (2006). Syndrome specificity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in young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family impact.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0, 184-198. <https://doi.org/10.1111/j.1365-2788.2005.00768.x>

Bluth, K., Roberson, P. N. E., Billen, R. M., & Sams, J. M. (2013). A stress model for couples parent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and Review*, 5(3), 194-213. <https://doi.org/10.1111/jftr.12015>

Brobst, J. B., Clopton, J. R., & Hendrick, S. S. (2009). Parent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the couple's relationship. *Focus on Autism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4(1), 38-49. <https://doi.org/10.1177/1088357608323699>

Chang, C. C., & Shiah, Y. J. (2018, April 26-30). *From disengaged-reasoning morality to self-cultivation ethics: A Confucian-Buddhist-Taoist culture inclusive ethical healing model*. The 12th APNME Annual Conference, Kaohsiung, Taiwan.

Chau, T. T., Hsiao, T. M., Huang, C. T., & Liu, H. W. (199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family Apgar index in the Chinese.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7(1), 27-31.

Cheng, T. A., Wu, J. T., Chong, M. Y., & Williams, P. (1990).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82(4), 304-308. <https://doi.org/doi:10.1111/j.1600-0447.1990.tb01389.x>

Chiang, H. M. (2014). A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 for parents of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pilot study. *Focus on Autism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9(2), 88-94. <https://doi.org/10.1177/1088357613504990>

Dabrowska, A., & Pisula, E. (2010). Parenting stress and coping style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down syndrome.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4, 266-280. <https://doi.org/10.1111/j.1365-2788.2010.01258.x>

De Pierris, G., & Friedman, M. (2018). Kant and Hume on causality. In N. Zalta (Ed.), *The*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 De Wit, T. W. (2018). "My Way": Charles Taylor on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n a secular democracy. *Stellenbosch Theological Journal*, 4(1), 153-178.
- Estes, A., Munson, J., Dawson, G., Koehler, E., Zhou, X. H., & Abbott, R. (2009). Parenting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mong mo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elay. *Autism*, 13(4), 375-387.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09105658>
- Estes, A., Olson, E., Sullivan, K., Greenson, J., Winter, J., Dawson, G., & Munson, J. (2013). Parenting-relat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mothers of todd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Brain & Development*, 35(2), 133-138. <https://doi.org/10.1016/j.braindev.2012.10.004>
- Garcia-Lopez, C., Sarria, E., Pozo, P., & Recio, P. (2016). Supportive dyadic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 couples parent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6(11), 3434-3447.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16-2883-5>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P.,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In P. Devine & A. Plant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5-130.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Inc.
- Haidt, J. (2007).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316(5827), 998-100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37651>
- Hayes, S. A., & Watson, S. L. (2013).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stress: A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ing stress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3(3), 629-642.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12-1604-y>
-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3), 61-83.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999152X>
- Hwang, K. K. (2019).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9(2), 67-80. <https://doi.org/10.1037/teo0000086>
- Hwang, K. K. (2020). Escape from Kantian Eurocentric bia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ulture & Psychology*, 26(4), 863-878. <https://doi.org/10.1177/1354067X20922145>

- Joshanloo, M., Van de Vliert, E., & Jose, P. E. (2021). Four fundamental distinctions in conceptions of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In M. L. Kern & M. L. Wehmeyer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sitive education* (pp. 675-703). Palgrave Macmillan/Springer Nature.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4537-3\\_26](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4537-3_26)
- Kasari, C., Freeman, S., & Paparella, T. (2006). Joint attention and symbolic play in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intervention stud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ical Psychiatry*, 47(6), 611-20.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5.01567.x>.
- Lau, W. Y. P., Peterson, C. C., Attwood, T., Garnett, M. S., & Kelly, A. B. (2016). Parents on the autism continuum: Links with parenting efficacy.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6, 57-64. <https://doi.org/10.1016/j.rasd.2016.02.007>
- Lovasz, A. (2018). Niklas Luhmann and posthuman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Problems*, 8(1), 1-17.
- Luhmann, N. (1995). *Social systems* (D. Baecker & J. Bednarz, Tr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nsky, Y., Hastings, R. P., Weiss, J. A., Palucka, A. M., Hutton, S., & White, K. (2017). Comparativ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and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group interventions for parents of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7(6), 1769-1779.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17-3099-z>
- McIntyre, L. L. (2013). Parent training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challenging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 R. P. Hastings & J. Rojahn (E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hallenging behavior, Vol 44*, 245-279.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Inc.
- Pisula, E. (2011). Parenting stres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M. R. Mohammadi (Ed.), *A comprehensive book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ch Open.
- Saxbe, D. E., Golan, O., Ostfeld-Etzion, S., Hirschler-Guttenberg, Y., Zagoory-Sharon, O., & Feldman, R. (2017). HPA axis linkage in parent-child dyads: Effects of parent sex, autism spectrum diagnosis, and dyadic relationship behavior.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9(6), 776-786. <https://doi.org/10.1002/dev.21537>
- Shweder, R. A. (1982). Beyond self-constructed knowledge: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moralit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8(1), 41-69.
- Sim, A., Cordier, R., Vaz, S., & Falkmer, T. (2016).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couples raising

- a child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31, 30-52. <https://doi.org/10.1016/j.rasd.2016.07.004>
- Smilkstein, G., Ashworth, C., & Montano, D. (1982).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amily APGAR as a test of family function. *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Issues*, 15(2), 303-311.
-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 (1995).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 (2000). *What's wrong with foundationalism: Knowledge, agency, and the world*. (Vol. 2). MIT Press.
- Taylor, C. (2001).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J. Scott (Ed.), *Schools of thought: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pp. 139-1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tters, E. (2011). *Crazy like u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 Free press.
- Webster, R. I., Majnemer, A., Platt, R. W., & Shevell, M. I. (2008). Child health and parental stress in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 preschool diagnosis of developmental delay. *Journal of Child Neurology*, 23(1), 32-38. <https://doi.org/10.1177/0883073807307977>
- Wertheimer, M. (1923). Untersuchungen zur Lehre von der Gestalt II.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4, 301-350.

## **The Challenge and Solution of Modern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engaged Reasoning of Charles Taylor.**

Chia-Chun Chang\*

### **Abstract**

"Disengaged reasoning" is the "hardcore" of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western cultural systems are also related to this hardc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aylor's conception of "Disengaged reasoning" and analyzes the rise and challenges of r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Western philosophy tended to misplace its ontology with procedure justice to the overextension of disengaged reasoning. As this article suggested, misplaces on ontology may cause psychology's fragmentation, deindividualization, and dis-intentional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l these challenges could be solved by reviewing the misplaced ontology benea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can always learn from each other, even if each appears dissimilar.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modern psychology might be able to learn from the idea of the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cultural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The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cultural system considers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s a dynamic system and emphasizes this as a dynamic ent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point of view on humanity could be th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s above.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and possibility of this idea,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a pioneer empirical study of psychological group therapy for the parents of ASD children. As a result, the pioneer study suggests a different path to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Further, I discuss an integration point of view to treat the impact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Keywords: Charles Taylor, the challenge of psychology, disengaged reasoning, rationalism, positivism*

---

Chia-Chun Ch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Meiho University  
(Changchiachun001@gmail.com)